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现代产业新区发展研究基地

资助出版

赵春燕◎著

整合性社区建设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建设的记录与思考

当前，全国各地社区建设呈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社区建设经验与规律亟须进行总结和提炼。从社区管理及社区发展角度看，整合是社区工作的实然表现和应然追求。



中国言实出版社

整合性社区建设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建设的记录与思考

赵春燕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整合性社区建设：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建设的记录与思考 / 赵春燕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171-2119-0

I. ①整… II. ①赵… III. ①社区建设—研究—大兴区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222 号

责任编辑：代青霞

文字编辑：李琳

封面设计：徐晴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3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171-2119-0

前 言

当今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社区建设的经验成果亟须进行总结和提炼。北京市的社区建设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社会建设的“1+4”文件，奠定了相关工作的总体规范。其中的“1”是指一个纲要，即《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4”是指两个办法和两个意见：两个意见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两个办法是《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化是北京市当前社区建设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的正南方，与天津市、河北省毗邻。大兴区原为典型的农业区县，传统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高，农村地域面积较大。2010年，随着北京市城南开发计划的实施，以及之后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政资源整合、首都第二机场的开工建设，大兴区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实现了产业转换。同时，社会管理体制也在同步实现蜕变，农村的乡镇开始逐步走向地区办事处，以及之后的街道办事处。社区的数目也在成比例地上升。社区建设在短时期的迅速发展，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这些内容均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和思考。本书即以大兴区为观察对象，对2010年至今该地域内的社区建设工作进行记录，一方面为理论工作者提供继续研究的素材，另一方面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

本书的主题在于探讨一条整合性的社区建设之路。第一编“整合性社区建设理论探讨”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理论论证与建构。《整合性社区建设刍论》对当下盛行的一种对社区认识的“本质化”倾向进行了反驳，进一步指出整合性认识的特点。“从社区管理的角度来看，整合性意味着，管

理的重点在于对社区内外部关系的协调，通过相关群体的认可和参与来促进社区和谐；从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对社区周边资源的开发来促进社区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整合性社区建设的工作路径》则进一步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明确了该观点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比较视角下的社区治理》以比较的方法对于北京市的社区建设、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及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三种不同的社区治理形式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台湾地区当今卓有成效的社区营造的经验可以直接提供更多的关于整合性社区建设的借鉴。《社区评价的纠结与困惑》则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评价指标体系项目的反思，指出传统的评价标准及工作方式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第二编“整合性社区建设经验总结”部分则旨在通过对社区建设实践经验的介绍进一步阐述上述观点。《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的经验与启示——以北京大兴区清源街道为例》以一个街道为事例，全景化地展示了整合性社区建设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社区群众工作的效用与基础——从大兴区两起主动拆违事件说起》则通过两起典型的群众主动拆违事例集中介绍了整合性社区建设中的群众工作方法。《社区自治的语义分歧及其现实弥合之可能——基于社区准物业管理经验的考察》通过集中考察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如何进行社区居民自管会建设的实例阐释社区自治实现的现实化途径。《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模式探索——以北京市大兴区村庄社区化模式为例》《城乡差异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对北京市大兴区村庄社区化管理的新解读》两篇文章则通过对村庄社区化这一新的村庄自治模式的介绍对城乡接合部社区如何协调城市、农村双重资源，实现社会治理进行了探讨。以上实践经验部分附有相关的工作总结和工作通讯。

第三编“关于整合性社区建设对话”则通过与社区实务工作者的交流来验证和丰富上述内容。大兴区的社区工作者，尤其是居委会主任，凭借其丰富的地方知识以及切实有效的工作经验，为全区的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活”的知识较书本上的知识更为重要。大兴区刚成立社区即20世纪90年代时期的第一批居委会主任，如今刚刚退休，他们的经验迫切需要进行总结。本部分内容则通过与两位已离任的居委会主任和一位刚离任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的对话，一方面对其工

作经验进行记录整理，另一方面就“整合性”内容与其进行了交流。

第四编“社会组织建设”与第五编“社区共建”属于一些外围延伸性的内容。《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定位与激励不足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北京市大兴区社会组织的调研》对大兴区当前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内在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研究——基于三圈理论进行的理想型观察》则通过对“十方缘”这一作为理想型的社会组织的介绍，指出了社会组织发展战略的一般模式。《“三圈理论”视野下的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分析——以某高校社区社会服务合作项目为例》《社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大学生社区服务活动为例》两篇文章则重点介绍了作为大兴区战略合作单位同时也是社区建设的共建单位的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参与社区共建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目 录

第一编：整合性社区建设理论探讨	1
整合性社区建设刍论	2
整合性社区建设的工作路径	13
比较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22
社区评价的纠结与困惑	32
第二编：整合性社区建设经验总结	43
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以北京大兴区清源街道为例	44
社区群众工作的效用与基础 ——从大兴区两起主动拆违事件说起	55
附件1 和谐拆违得和谐 ——清源街道“三个一”工程拆违攻坚战纪实	61
附件2 大兴区和谐拆违第二季	64
社区自治的语义分歧及其现实弥合之可能 ——基于社区准物业管理经验的考察	67
附件3 大兴区无物业管理小区自管会建设经验总结	77
城乡接合部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以北京市大兴区村庄社区化模式为例	81
城乡差异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 ——对北京市大兴区村庄社区化管理的新解读	92

第三编：关于整合性社区建设对话	103
张仕玲谈话记录	104
王俊霞谈话提纲	114
张玉芳谈话记录	125
第四编：社会组织建设	137
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定位与激励不足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 ——基于北京市大兴区社会组织的调研	138
内在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三圈理论进行的理想型观察	151
附件4 十方缘访谈	163
第五编：社区共建	179
“三圈理论”视野下的组织合作决策的过程分析 ——以某高校社区社会服务合作项目为例	180
社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大学生社区服务活动为例	188
后 记	196

第一编：

整合性社区建设理论探讨



整合性社区建设刍论^①

摘要：对社区进行本质性认识不仅与社会现实情况不相符，而且也不利于实践工作的开展。如果从社区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位及具体的工作倾向上进行考虑，一种侧重于对社区内外部关系把握与协调的整合性认识更为恰当。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开展也不得不受限于社区的整合性语境。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定位对于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社区；本质；整合

一、对于社区本质的质问

什么是社区？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几乎自其产生之时就没有统一过。代表性的统计结论认为，这一概念有着 94 种，或者 140 多种的不同定义。^②而且，更新的研究成果还在不断地扩大着这一数字。

当然，社区概念是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的起点。如果对一个事物连下定义都困难的话，似乎就没有进一步认识的可能了。于是，学者在对其概念上的争论进行梳理的结果最终都走向了对社区属性的归纳和本质的把握，也就是说对社区共性的提炼。

对社区本质的认识，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滕尼斯提到的“Community”，就是我们所谓的“社区”，“意思是公社、团体、共同体，滕尼斯用它来表示人们在血缘、地缘等自然关系基础上形成

^① 本文曾刊于《开发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张永理：《社区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的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大多存在于传统农村社会的自然村落中”。^①

定义是论述的前提。我国的学者一般也会顺着这一思路来对社区进行定义，进一步地从社区的定义引申出对社区本质的认识。罗建平从对“社”“区”两个字的语源分析入手，认为社区是“追寻一种心性得以依托的归属地”。^②李左人则从对现代化的异化性的批判中，指出社区精神就是善良、互助、共生等传统人性的回归。^③马丽娟则从对公民社会理论的发掘中发现其与社区建设的契合。^④某种程度上，学者们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理论认识和理想追求托付到了社区这一特定的语词之中。丁元竹对此的论述则更具代表性。通过对历史进程中的社区和思想逻辑上的社区进行归纳，他总结道：“社区的共性在于，作为人类的共同体，社区是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基于彼此相互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把个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为共同体服务来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是公民社会的形式和表现形态之一。”^⑤

对本质的认识有助于统一共识，进而统一行动。但是，实践中遇到的诸多具体问题实际上却显示了共识导向上的困难。比如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选定，究竟是由本社区的居民来担任，还是由外社区的居民来担任。如果从居民自治，社区共同体营建的角度出发，选择似乎理当然是前者。因为只有涉及自己的事务才会进行自治，也才会真正投入热情。否则，相关的工作就只能算是一种代理，或者说是管理了。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如此，在北京的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般是跨

① 汪大海主编：《社区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 罗建平：《“社区”探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7-70页。

③ 李左人：《“回归社区”与社区精神重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5-80页。

④ 马丽娟：《社区建设与公民社会发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11-114页。

⑤ 丁元竹：《理解社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41-149页。

社区进行交叉任职的。对于为什么不由本社区居民中选举产生居委会主任，某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人员的如下解释可能更能说明问题。（访谈资料 ZYF20150116）^①

问：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居委会主任应由居住在本社区的居民担任。

F：我看，（居委会主任）是不是要住在本社区，不一定！如果新建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选居委会主任）可能不一定会有合适的人。如果没有，又要建居委会，那么怎么办？如果我住的离这里十万八千里，但是我的心在这儿，我对这个社区的事儿、实际的情况很熟悉就可以，没有必要非要（这个社区居民来做居委会主任）。没有必要这么教条，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来做）就可以。

问：这个说法主要是顺着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考虑的，既然居委会是社区居民的一个自治组织，就是说自己的事儿自己来管，那么只有本社区居住的居民才可以来管理自己的事儿。

F：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这个社区真有那样的人，还可以。但是，说实话，如果这个社区居委会主任住在这个院，他（她）在这里干，实际上就不是很科学。工作会给他（她）私人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这个和下班就走了，有时间有安排的情况就不一样。好多居民知道你住在这儿，可能动不动地，他们就会去敲你门。这个给家里其他成员的正常生活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涉及社区自治，我感觉这个没有必要按教条。

原来我们那儿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就是这样的，她原来那个社区面临老旧社区改造，这么大的社区，而且牵扯到几栋从宣武迁拆过来的居民。本来这些居民就因为拆迁政策对社会有不满情绪，蛮横不讲理，老想找事儿，工作难度非常大。她原来就在这儿住，那真是第一打电话、第二敲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会找你。她说：“我自己还没事，可我的孩子呢？他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学。”她那时（人）真是都快崩溃了。你如果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会在外面嚷，你如果给他们开门，他们在里面也会嚷。人家的老人不睡觉吗？人家的孩子不睡觉吗？这就会打扰人家家

^① 文中访谈资料均来自于笔者 2010—2015 年在北京市大兴区社区调研所得。

里人的正常生活。

问：那后来怎么样了？

F：工作上，我们给她换社区了；另外，她也把房子卖了！

看来，如果真有共同体建设的话，共同体的建设也需要与私人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社区本质的认识是出于管理工作的需要。管理的基础是规范，规范同样需以一定的共识为基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的规制在实践中同样出现了偏差。北京市的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建设所遇到的问题就很有代表性。为了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业主自身的事务最好由业主自己来进行料理。业委会产生的理论前提与社区的本质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为了促进观念的实际化操作，北京市于2010年制定了《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19号）。但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却大大有悖于这一理想化的期待与设计。不论是从美丽园事件还是在具体的“炒物业”的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业委会运行存在好多难以解决的硬伤。^①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业委会的代表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业委会成立初期如何自发有序地开展选举；选举之后，业委会成员的专业技术如何予以保障；业委会成员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委会工作的关系；业委会成员的薪酬以及业委会的开支如何解决；等等。实践中，业委会反而有可能成为社区业主不满意的焦点，成为居委会与物业之间不和谐关系激化的燃点。尽管《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做好辖区内物业管理以及和谐社区建设的相关工作。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区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活动进行协助、指导和监督，协调处理纠纷。”但是，从城市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的角度来看，扶持业委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一个非常不情愿完成的任务。从长远来看，本法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文。就业委会这个例子而言，我们看到，如果说有共同体建设的话，其必将是一个高成本的任务。

^① 吴俊：《物业纠纷案件社会学分析——以北京美丽园物业纠纷为例》，《管理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9-111页。

当然，相关的学者们还会提出这样的申辩理由：共同体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当前的居民主体意识需要慢慢培养，之后再通过一步步引导才可逐步予以实现。但是，核心的问题正在于，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是社区居民自动形成的，还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臆想出来要加给他们的。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过程，那么它也只能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其具体的方向和目标需要不断地去发现和总结，而不是提前去进行设定。就这一点而言，对未来的认识和对当下的认识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解释桥的概念的时候，就提到，在对“什么是桥”这一平常熟悉的语词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时会遇到限定不准的问题。^① 维特根斯坦则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这一问题。语词具有沟通交流的用途，但是，人们对语词的交流却不需要以准确的共识作为前提。^② 人们可以用扫帚、算盘、计算机这些名词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尽管不同人所理解的相关名词会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如果考虑到这些名词的共时性、历时性差异，理解上的偏差可能会更大。对于社区、村庄、国家之类抽象概念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如此。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已显示，社区概念存在一个长期的衍变过程，当前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人们的认识存在非常大的差别。^③ 实际上，即便是对于滕尼斯而言，他所谓的共同生活的社区与当今我们提到的共同体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滕尼斯更多地强调那种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依赖关系，我们更多地强调去建设一种新的联接性关系。为了交流的需要，人们存在认识上的共性或者说思维上的重叠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简单地将这种认识进行提炼、裁剪，进一步提出规范性要求，可能就会产生削足适履的后果。

二、社区整合的强论证

因此，我们更多地应当把目光从社区本质的认识上转移开来，转移到社区的现实存在上，转移到对社区具体表现的认识上。社区建设的目标，

① 茅以升：《桥话：桥梁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② [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③ 张永理：《社区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不是为了建设什么共同体，而是为了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从社区管理及社区发展的角度看，整合性是社区工作的实然表现和应然追求。从社区管理的角度来看，整合性意味着管理的重点在于对社区内外部关系的协调，通过相关群体的认可和参与来促进社区和谐；从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对社区周边资源的开发来促进社区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与对社区本质的认识所不同的是：从时间性上来看，它的工作重心体现在当下，而不是致力于对未来的憧憬；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表现为对既定社会关系的有效协调与整合，从而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主动性地建设。

之所以将社区工作的落脚点放在社区整合的具体表现上，而不是放在共同体建设的社区本质上，是由以下两点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其一，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角色问题。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居委会成员形式上均是由社区居民代表（少数地区是户代表）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因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居委会成员的产生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街道办事处。而且，在北京市当前的体制之下，社区居委会主任与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的比例还相当高。但另一方面，因为社区工作开展需要借助居民参与，社区工作成效需要得到居民认可，社区居委会成员会自觉地将为居民服务作为自身工作的出发点。这一点从当前大多数居委会筹备处的工作实践中看得更为明显，街道办事处一般也会将筹备处的临时负责人顺利当选为居委会主任看作居委会建立、顺利开展工作的标志。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居委会主任是由基层政府进行委派的，因为其在产生的形式上均表现为居民自主选举产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居委会主任就是居民的代言人，因为居委会主任一般均不是由居民代表逐级提名自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政府提名的专职工作人员。这一角色产生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了其介于中间的双重性。其既需要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之后积极进行解释和说服，结合社区特点进行变通；同时又需要及时反馈民声，进行区域内利益的维护。居委会的工作特性因此不可能以单向的建设性作为其目标追求。从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上，其实际上也没有开展共同体建设工作的有效基础。即便不考虑基层政府的影响，居委会也只能算是社区居民的委托代理人，因为他们没有得

到明确的事项性授权，只是一种名义性的“代表”。因此，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去发动居民，在居民的实际参与中发现民意，整合民意。行动的过程性要远远大于其目的性。当然，学者们可能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当前的社区民主尚不成熟，因此导致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乏力。但实际上，即便是完全履行过民主选举程序的社区自治机构，其代表性也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的特点，正如大多数的社区业委会与社区居民“先热后凉”的关系那样。

其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倾向问题。在对几个社区进行调研时，我们在感叹社区活动开展的内容丰富、效果显著时，同时也想进一步了解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某居委会主任的回答很有启发。（访谈材料 ZSL20141212）

问：你们社区搞的各类活动，大概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Y：哦，那些东西。我就觉得那叫借力。学会借力，借助别人的力完成你的事情。这是我多年的经验。借力！多方向的借力！包括：借居民领袖的威望完成你的事情，这是一个借力；借街道干部的力量完成你的心愿，这是一个借力；借你班子成员的力量完成你的工作。学会借力，这非常重要！

这种借力主要表现为对于辖区内资源的有效利用，既包括各个共建单位的奉献，也包括对社区精英和积极分子的发现和培养。为了有效地动员更多的力量，居委会实际上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和现实定位。正如该居委会主任讲到的，只有“各取所需”，才能撬动社会资源，为我所用。（访谈材料 ZSL20141212）这种各取所需只能是一种协调和整合，而不是单向的要求和驱动。

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社区地图”的绘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 社区地图，简而言之就是社区发展可借力的社会资源的分布图。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社区营造的技术支持人员会引导社区居民绘制社区地图，详细分析社区内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通过社区地

^①（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主编：《99年度南部地区农村再生培根计划书》，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2011年，第6页。

图，相关人员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到社区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现实需求，进一步去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北京市的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沿着这样的工作思路来进行的。比如大兴区推行的“一区一品”建设，初期即要求进行社区调查，了解社区的实际特点，进而根据现实需求和社会资源制定工作计划。清源西里社区“兵妈妈服务队”项目在此堪称典范。^①2004年，在区“双拥办”的支持下，清源西里社区居委会与武警四支队十五中队（后来换防改为武警四支队一中队）结成共建对子。居委会首批组织了15位退休的妇女成立了第一支兵妈妈服务队。兵妈妈服务队的项目设计充分体现了整合性开展社区工作的思路。一方面，驻地部队与社区的现实需求可以很好地进行对接，驻地部队战士多为80后、90后出生，离乡离家之后无所依靠，相当一部分战士还是在单亲家庭之中长大，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清源西里社区则属于区内典型的老旧小区，社区内退休人员多，年轻人少，社区活力不够。两方面的考虑使得项目开展非常顺利，社会效果极为明显。截至2008年，5年间，兵妈妈们先后认下31个兵儿子，她们以知识与母爱使一个个的问题战士转变为优秀士兵，发挥了“编外指导员”的作用。士兵们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活动中来。他们经常到社区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参加文艺演出，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新气息。

因此，社区建设的整合性要求我们放弃对社区本质的探究，进而要求进行从下而上的认识总结，在对社区充分熟悉了解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的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

三、社区整合的弱论证

从另外的角度上讲，即便是社区工作人员有着强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意识，并且具备相应的能力要求，实际上仍然难以进行共同体建设工作，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体现对社区的本质追求。

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社区工作人员往往无法决定社区发展的起

^① 清源西里社区党支部、清源西里社区居委会编：《大兴区清源街道清源西里社区2002—2008》，2008年12月，第98—104页。